

【一般论文】

论谢枋得于生死节义之间

Study on Xie Fang between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ath

刘雪飞¹、符爱萍² (苏丹依地理斯教育大学)

Liu Xue Fei & Foo Ai Peng

Sultan Idris of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876585850@qq.com, aipengfoo@fbk.upsi.edu.my

Received :27 AUGUST 2024; Accepted:24 SEPTEMBER 2024; Published:12 DECEMBER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Liu, X. F., & Foo, A. P. (2024). 论谢枋得于生死节义之间: Study on Xie Fang between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ath.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2), 16–32.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2.2.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2.2.2024>

摘要

谢枋得是由宋入元的典型遗民文人，在元朝统治之下生活了十年之久，最后走上了殉节之路。本文通过分析谢枋得宋末元初时段的言行，探究其欲为大宋遗民、又想以大元逸民处世的心态，探讨谢枋得是如何在元朝欲重用之时反而走上了殉节之路，为何选择漫长又残忍的绝食方式，死节是否为必然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宋元遗民文人及其作品的研究。

关键词：谢枋得、遗民、逸民。节义、心态

¹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在读博士生

²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

Abstract

Xie Bingde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 He liv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Yuan Dynasty for ten years. Through the study of Xie Bingde's works and behaviors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his desire to be the adherents of the great Song Dynasty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Yuan Dynasty. Xie Bingde's attitude towards the two governmen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literat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change of China in the 13th century, discussed how Xie Bingde wanted to reuse him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martyrdom.

Keywords: Xie Bingde, adherents of Song Dynasty, Survival, Integrity

一、前言

谢枋得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和爱国诗人，生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其人性好直言，以忠义自任，每与他人谈论古今大事，就激动不已，跳跃自奋，其师徐霖称其“惊鹤摩霄，不可笼繫。”³宋朝未亡之时，谢枋得多次上书痛批奸臣董宋臣、贾似道等，仕途颇为坎坷，为官不足八月；后蒙元军队攻宋时，谢枋得用妻之妆奁集资，毁家纾难，积极筹备抗元斗争；宋亡后，谢枋得隐居福建，五拒征召，终绝食死于大都。谢枋得一生忠肝义胆，坚守节气，是可与文天祥齐名的民族英雄，是典型的大宋遗民，且具有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双重身份。

谢枋得是唯一一个在元朝统治十三年之后而殉国的人，其死颇具代表性、独特性。在元朝建立后的十三年间，谢枋得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殉节报国：与蒙元大军在安仁、信州等决战时，兵败而逃，未死国；谢太后携幼帝献表投降之际，未降未殉节；厓山之败宋朝彻底覆灭，不曾殉国；以及数次征召之时，拒聘却未死节。谢枋得“理应”殉国的“时机”都没有捐躯，反而是在元朝欲重用南方文人的节点上，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谢枋得走向了殉节之路。尤其是，谢枋得已决心为国尽忠、舍生取义，为何会采用绝食这种痛苦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且还是从福建千里迢迢坚持到大都才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遗民之死

德祐二年（1276），是南宋与蒙古交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元相伯颜带军逼近临安，谢太后携幼帝奉表请降，不久三宫被当作战俘屈辱北上。此时的谢枋得正在安仁与吕师夔交战，其部将张孝忠、章如旦及门生李天勇等战死沙场，王震叔、罗一理，被俘后自杀殉国，谢枋得退守信州，不久后其伯父谢徵明、其子君恩、君赐也同时牺牲。

四月，谢枋得受到了宋太皇太后从大都发出的降元诏令，谢枋得弃官闭居。随后，端宗任命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在弋阳组织抗元，谢枋得七月进攻铅山失败，逃往福建。此时的谢枋得似乎已不是那么斗志昂扬，当时的抗元斗争仍此起彼伏，尚未断绝。此外，元至元十五年（1278），祥兴帝即位，迁于厓山。文天祥听闻陈宜中、张世杰建立了另外一个南宋朝廷，喜不自禁，带兵抗元，伺机复兴。另一名爱国志士谢翱听闻后，也带领乡兵，追随文天祥，转战福广，而谢枋得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仍然闭居于福建深山。

³ 谢枋得著，熊飞、漆身起、黄顺强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155。

谢枋得首败安仁、再败信州，弃家隐居他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谢枋得算是个“逃兵”，缺乏慷慨赴死的勇气。他没如其部将门生那般战死沙场，也没如亲戚那般誓死抗元。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谢枋得为了自己的生，置家人于不顾，弃老母亲于险境，妻子、儿女、弟侄也因他身陷囹圄，妻女更是自缢于监狱，家人多受罹难！即使他也是迫不得已。《忠昭录·谢枋得》记载：“王世英、萧郁以谢枋得不降，遣兵袭之，执其妻李氏，子熙之、定之、二弟、三侄及一女、二婢……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诘兄所在，不答，唯请死，杀之。”⁴

谢枋得为何没有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殉国，或许可以通过下面几首诗来窥探一番。“洪钧一转岁开端，草木群生亦喜欢。安得明年此时节，江东重覩旧衣冠。”（《元旦阻雨·其二》）⁵“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春日闻杜宇》）⁶这两首诗都写于他逃亡福建时期，从中可看出谢枋得对于大宋能够再度复兴还是有所期待的，而当时文天祥兵入江西，连续收复数州县，并且各地抗元武装纷纷兴起。无疑，这对谢枋得具有较大鼓舞作用。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厓山兵败，陆秀夫背负幼帝跳海，南宋流亡政权覆灭，历史彻底进入元朝。按理说，如果谢枋得此前没有殉国是因为有所希冀，盼望着文天祥等人能够收复河山，那么此次国亡主灭，文天祥被捕，谢枋得确实无可期待，可以为宋尽忠了。但听闻宋亡之后，谢枋得东向恸哭，衣麻蹑履，埋葬了他对宋王朝复兴的最后一丝希望。此后，为摆脱元军追捕，谢枋得逃窜于山林沟壑，在武夷山开始了他的隐居流亡生活。

那么对于前朝南宋，谢枋得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可以在他却聘之作中找到答案。在拒聘之余，谢枋得反省了大宋何以灭亡的原因。《上丞相留忠斋书》中记载“贾似道，执国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误国殃民，其恶不可一二数。拘行人，负岁币，满朝无一人敢言其非；兵连祸结，亡在旦夕，满朝无一人敢声其罪。善类亦可自反矣！”⁷谢枋得在这里痛斥贾似道欺君罔上的罪行：与蒙古军求和、谎报战功、敌军来临率先逃跑。其实在南宋未亡之前谢枋得就曾多次抨击过贾似道，贾似道曾行打算法污蔑抗蒙将领贪污军费，谢枋得怒不可遏上书，被撤职；景定五年（1264）谢枋得在建康主持考试，利用试题发策十问，揭露贾似道误国误民之行径，最后却被贬兴国军。“今年遣使祈请，明年又遣使祈请；今年遣使问安，明年又遣使问安。一使死于前，一使继于后。”、“而宋自戊午至甲

⁴（宋）佚名，《忠昭录·谢枋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页39。

⁵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148。

⁶同上注，页148。

⁷同上注，页6。

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⁸两个“又”字可以看出谢枋得对南宋奉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可谓是愤怒至极。有宋三百年，宋朝对外抗争总体上处于弱势，在此前与辽、金的对峙中，宋朝通过割地、纳岁币、签订不平等协议，屈辱求和以换得片刻苟安。到了南宋更甚，南宋统治阶级不仅无意北进，还打击如岳飞这样的爱国志士，虽暂时得以偏安，但人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重大打击。除此之外，谢枋得还认为宋朝的礼法不复，纲常不存也是导致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咸淳甲戌而后，不复有礼法矣。贾似道起复为平章，文天祥起复为帅阍，徐方直起复为尚书，陈宜中起复为宰相，刘黻，起复为执政。饶信斗筲穿踰之徒，钻刺起复，不可胜数，三纲四维，一旦断绝，此生灵所以为肉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岂非后车之明鉴乎！”⁹纲常伦理一直是谢枋得安身立命之道，他拒绝仕元的道理概也在此。

一则奸臣当道，二又朝廷软弱无能，加之礼法不复，南宋君臣在精神上早已垮掉。谢枋得对大宋此前的政治有颇多怨言，其灭亡的结局亦是必然，“天怒于上，人怨于下，国灭主辱，理固宜然，天实为之，人岂能救之哉！”¹⁰所以，面对宋朝覆灭的消息，即使悲痛万分，谢枋得并没有过于震惊或过激的言行，更没为之献身。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文海南下访贤事件，是南方文人地位得以提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早在至元十九年（1282）程钜夫就向元世祖提出了关于吏治五事的建议，有三条都是关于南方官吏问题，元世祖听取了大部分，这意味着元廷开始认真考虑江南治理的问题。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再次上疏，希望朝廷能够对南、北一视同仁，让江南的贤才为元廷服务，也得到了元世祖的同意。对于元世祖同意一视同仁地公选南、北官员的举动，对江南士大夫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同年四月，程钜夫奉诏下江南访贤。临行前，元世祖还特命用蒙古字、汉字书写访贤诏，细节之处，昭示出他对此次访贤之行的重视以及他对江南士大夫的示好之意。而谢枋得也名列其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¹¹

在此后五次征召中，谢枋得有三次写了却聘书。在《上程雪楼御史书》中，他给的措辞是自己不是可胜大任之材，及依古礼，母丧在身，自己需要守孝三年。在第二封《上丞相留忠斋书》中，谢枋得仍以为母守丧为由，同时还表明自己从未归附过元朝，现在也不会仕元。考察谢枋得宋亡后的行踪，我们可以发现

⁸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6。

⁹ 同上注，页 5。

¹⁰ 同上注，页 2。

¹¹ 同上注，页 155。

谢枋得以母丧为由不能为官，不过是一个借口。“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¹² 自从谢枋得逃往福建之后，就未曾归家看望老母亲，即使他在《思亲五首》中表明自己如何思念、如何愧疚不安。元朝没有大赦之前或许可以有一番说辞，但大赦后，谢枋得仍然没有归家尽孝，而是让其子熙之归养祖母，《忠昭录·谢枋得》记载：“至元十五年，行省都镇抚陈某，名诸子从熙之学。凡六年，资其归，遂偕弟往闽省父。枋得命熙之归养祖母，定之留待，日以卖履为生。”¹³ 谢枋得直到母亲去世才回家奔丧。所以，以老母在堂需要奉养所以不死，实为借口。同样，此次以母亲丧事为由推脱为官，虽合常理，也是托辞。而在第五次被征召、与魏天祐交谈时，谢枋得给出了自己为何活于元朝的原因。书信中载：“惟愿速死，与周夷齐、汉龚胜，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万世为臣不忠者。”¹⁴ 相比于前两封书信，谢枋得提到了一个新人物“龚胜”。龚胜，字君宾，西汉王莽篡权后不仕新政绝食而亡。王莽篡权后，曾派将帅捧着羊和酒去问候龚胜，第二年，又想任命龚胜为讲学祭酒，被龚胜以有病在身为由推脱。过了两年后，再次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拜龚胜为官，使者甚至把印绶放在他身上，五天一次问候，多次拒绝后，龚胜选择了饿死报国。“‘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义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¹⁵

如此看来，谢枋得的境遇和龚胜何其相像。在未被征召之时，谢枋得曾写过诗句“飞花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庆全桃花庵》）¹⁶，再结合他后期押解北上的诗句“平生爱读龚胜传，进退存亡断得明。”¹⁷（《辞洞斋华父二刘兄惠寒衣》），这里的“渔郎”很可能就是征召之人，此外，宋亡后谢枋得似乎就一直把龚胜当做自己人生的方向标：只要不仕元，就可以安然地活下去。因此，可以看到在北上之日与好友唱和时，谢枋得多次提到龚胜：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¹⁸（《崇真院绝粒偶书》）

“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¹⁹（《诗别二子及良友》）

“不为苏武即龚胜，万一因行拜杜鹃。”²⁰（《和曹东谷韵》）

¹²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

¹³（宋）佚名，《忠昭录·谢枋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页 39。

¹⁴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48。

¹⁵ 班固（汉），《两龚传》，载《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 72。

¹⁶ 同上注，页 149。

¹⁷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42。

¹⁸ 同上注，页 127。

¹⁹ 同上注，页 137。

²⁰ 同上注，页 138。

“了知死别如龚胜，未必生还似子卿。”²¹（《和叶爱梅韵》）

“此生何恨为龚胜，来世谁能知少连。”²²（《和毛靖可韵》）

在形容龚胜的时候，谢枋得用了一个“洁”字，而不是“烈”字，这何尝不是谢枋得心理的一种投射，“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名节，只要没有出仕新朝，人格就不会留有污点。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士大夫文人的特定认知。谢枋得并非激烈型的遗民，无法兼善，那就独善其身。此外，《叠山集》中还提到了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三位精神偶像给了谢枋得以死自誓的巨大精神动力。门人周岳曾说：“自商夷齐，汉龚胜，至先生不食异姓之粟而死者，仅四人。”²³ 因而，谢枋得在宋亡之际没有“尽忠”殉国，面对新朝五次征聘，亦断然拒绝，待时机成熟，以绝食的极端方式舍身成仁。这都与其根深蒂固的思想认知密切相关。

一是谢枋得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人民的关怀，对故乡山河和亲人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认同，这是谢枋得爱国思想的核心，并使他的爱国思想远超出了单纯抗元斗争的范围。国家，在此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除了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权之外，还指生养哺育人们的山川大地和人民群众，也包括故乡和亲人师友，包括儒家文化。正是对这一切的热爱，才使谢枋得强烈憎恨南宋的贪官污吏和蒙古贵族压迫者。他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父亲谢应诱曾任浚州签判，为人正直；母亲桂氏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受到父母有关忠义爱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谢枋得在被押赴大都时还高唱“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²⁴（《和曹东谷韵》），充分表达了他那威武不屈的民族骨气和贫贱不移的高尚志向。同时谢枋得深受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熏陶，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四书五经，谢枋得非常熟悉祖国的历史，并常以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为榜样。他特别敬仰辛弃疾，一则都是诗人，是爱国者，情趣相近，志向相同；二则谢枋得和辛弃疾均属同朝，辛弃疾长期在铅山定居，有亲切感。1271年，当元军长期围攻襄、樊，南宋国运垂危之秋，谢枋山曾与同志十七人在铅山金相寺集会祭奠辛弃疾，盛赞了他“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²⁵，表示要将他的言行录于书史。当然，谢枋得的爱国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但谢枋得“从道不从君”，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才报以无限忠诚。当皇帝的旨义与谢枋得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

²¹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38。

²² 同上注，页 139。

²³ 同上注，页 179。

²⁴ 同上注，页 138。

²⁵ 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载《宋史》，卷 401。

从皇帝的命令。如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 1276 年从大都寄来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南宋各地臣民降元的招书时，谢枋得并未服从。他在《上丞相留忠斋书》直言：“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可见，谢枋得对皇帝并非毫无原则的愚忠。

二是程朱理学思想。谢枋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又是南宋大臣。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一生恪守封建道德，谢枋得誓不仕元，从思想根源来说，一是为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元朝初期斯文遭践踏，文坛萧条，儒生被欺凌，儒道被遗弃。同时元朝把人分为四等，汉人和南宋遗民地位最低，谢枋得反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反对的是元朝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二是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建立，文化道德上的专制主义必然是皇权所要求的。汉代的《礼记》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来强调皇权和父权，汉代董仲舒概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构成了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宋朝，在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和南宋婺源人朱熹，把封建伦理道德理论推到了顶点，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通俗化，并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南宋后期，朱熹所提出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谢枋得深受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说：“忠臣不化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常道也，……此某书中第一义也。”²⁶

三是道教思想。谢枋得信奉道教，这与历史环境有关，国破家亡的惨痛，使他对现实社会十分厌倦，逐渐滋生出世入仙的思想。道教的理想是世上没有战争，没有灾荒，人人安居乐业，信徒们能够通过修炼得道成仙。这种道教思想符合当时谢枋得的心理需要，谢枋得一向淡泊名利，不与豪门接近，生活俭朴，这与道教提倡的“清静无为”，非常接近。他在青年时期就精通《易经》，中年时期又信奉道教，在晚年所交的人物中，多半是道与卜方面的朋友，也有一些书画及文友，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和他们往返的文字之作。如《贺蔡芳原判镇为道士启》云：“满目氛埃，儒术不胜其拘贱；游神清静，道家尚可逍遥。”²⁷ 四十三岁以后开始学道家的“辟谷养气”之学。“辟谷养气”的养生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要“养气”，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的和谐安定和心理的平衡，平日要心平气静飘安静养神，“乐天知命”。其次，还必须保持人体内的清新洁静，而谷物、荤腥等都会破坏“气”的清新洁静，所以要除欲、禁食。禁食，也叫“辟谷”或“绝粒”。据道教的说法，神仙就是“饮风吸露”，不食人间五谷的。谢枋得为了练习“辟谷养气”，实行节衣缩食。从此不再服用丝绵衣被，常穿麻布服装。

²⁶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58。

²⁷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卷十。

平时他不吃或少吃荤牲，经常是只食少量蔬果。在流亡期间，曾遍访武夷山、龙虎山等道教圣地，还号称“依斋易卦”，为人卜课算命，几乎成了游方道士。他在《与菊圃陈尚书札》中写道：“某少日酷信书，谓患难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今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读道家书颇有益，不敢号于人曰。”²⁸ 陈杰于谢枋得北行途中为之送别，举杯斟酒，然谢枋得告知他自己已经辟谷绝食。陈杰称谢枋得为“武夷道人”，为之赋诗《御风行送武夷道人谢叠山》，其诗云：

武夷山中有伏龙，鬣卷云雨深重重，化为白须一老翁。
疾雷破山六丁取，置卫铜环森守虎，云是健将雨下土。
老翁一笑百不能，山中所读皆仙经，吾亦冷然御风行。
洪崖道上逢老友，手举无何指翁口，翁已辟谷安事酒。
青牛紫气关河昴，大鹏风斯九万里，回首蓬莱浅清水。²⁹

此外，谢枋得北行途中力却吕师夔寒衣时说：“身不丝绵二十年，后山冻杀分宜然。”³⁰ 道出自己辟谷养气已有二十载。谢枋得求仙慕道的经历，使他在对现实绝望之时仍可达到一种相对安宁的境界。两首《绝粒偶书》充满道教术语，同样是以道教的超脱心态表达自己的死节之志，而其中的安详与超脱确实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

绝粒偶书（二首）

其一

丹府金童善主家，百神听命静无哗。
从今何必餐松柏，但吸日精吐月华。

其二

龟衔甘露争先到，凤吸醴泉随后来。
投在太清仙酒瓮，道人日饮两三杯。³¹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距离其母桂氏去世（1286年2月26日）整三年略余，母丧丁忧期满；宋亡之际，谢氏一族几近灭门，谢枋得背负杀亲之恨；元军大举进攻南宋以来，谢枋得耳闻目睹过一次次血腥的屠城和杀戮。这些都是不共戴天的家仇国恨，谢枋得如何直面灭国屠城的仇敌而仕？此外，作为一个儒家臣子，他没有忘记人臣的忠义：刚到大都驿馆即刻问明宋太皇太后殡葬地和德祐皇帝所在的方位，然后跪拜，行君臣之礼并失声恸哭；痛哭同榜进士文丞相。于孝，于忠，于义，于信，谢枋得都已无憾。此时，除却

²⁸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卷一。

²⁹ 《全宋诗》卷3450，页41105。

³⁰ （宋）佚名，《忠昭录·谢枋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页39。

³¹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150-151。

了责任和使命，生命仅仅是生死而已，真的是“只欠一死”了。所以，谢枋得是不可能臣服，为元朝所用的。至此，既不能服从，终是难逃一死。

对于元朝政权而言，谢枋得构不成大的威胁，但会是一个麻烦。若能为元朝所用，则是治理江南的一大助力（政治和文化上），尤其是民心上。谢枋得忠君爱民的影响是最好的口碑，社会效应是极好的。而且，统治者历来十分赞赏忠臣义士，起初元统治者对谢枋得是尊重和敬佩的，能合作是最好的结局。但谢枋得三番四次地拒绝征聘，在某种程度上已激怒了元君。不管是什么理由，正当与否，都是对元廷的公开对抗，是对新朝施恩的无视，对新君权威的蔑视。所以，第五次征召已颇具强制性，恰巧执行任务的是小吏魏天祐。元统治者冷眼旁观魏天祐押解谢枋得北上。只是谢枋得北上的“新闻效应”和送别场景，出乎元朝意料，让一场强制性的招贤演变为坚守爱国气节的南宋遗民与元朝政权的一场政治对峙。他们再次深切感受到谢枋得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对故宋遗民表现出的忠君节义、爱国守贞的节操感到不解或吃惊。

最终，谢枋得绝食而亡，兑现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誓言，“全节”而胜。谢枋得没有成为“同仕新朝”的同道，这大概让魏天祐及仕元降臣很是失望，也更难堪。这个结果，应该也是元统治者不曾料想的：谢枋得竟如此决绝。谢枋得再次轰动南北，成为宋末元初继元好问之后，第二个因“节操”问题再次成为焦点的名人。无疑，就外在因素而言，谢枋得想做大元顺民不成，最后成为大宋烈士，元君是主凶，魏天祐是帮凶，故宋降臣及爱国志士推波助澜，促成了最终结局。

因此，在异族入主中原、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下，谢枋得面临的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更为激烈，其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严重，而龚胜就成为了他平衡心理的一个重要支撑。这或许能解释征召之时谢枋得多次拒绝，到第五次逃无可逃时才选择了以饿死明志。

二、逸民之梦

宋朝覆灭后，隐逸成为前朝士大夫文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归隐山林是保持名节的主要途径。此时谢枋得更多的是希望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黄昏人归花不语，惟有落月啼凄鸦。”³²感伤之中，也不乏陶渊明笔下月下荷锄而归之美感。“茂绿林中三五家，短墙半露小桃花。”³³这首诗中充满了生活点滴之美，生机与惊喜并存。隐居同时，谢枋得还去拜访了爱国学者熊禾，与之谈论前朝旧事和程朱理学。随后又前往道教圣地龙虎山，拜访许月卿，并且还表明“要知今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³⁴（《句》）

³²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128。

³³ 同上注，页 159。

³⁴ 谢枋得著，《谢叠山全集校注》，页 8。

元朝大赦之前的谢枋得隐居于道教圣地武夷山和龙虎山，研习道家经典，将精神寄托于道家思想，更多的是追求解脱痛苦，寻求超脱，“武夷访九曲，龙虎访仙岩，秦人之家计犹在。今而后，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读道家书，颇有利益。”³⁵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大赦天下，《叠山公行实》记载：“至元甲冑，黄华平，大赦，谢枋得乃出。”³⁶ 谢枋得出山定居，公开参与社交。一出山的谢枋得就拜访建阳史县令，并喝酒赋诗送他上京，在《送史县尹朝京序》中，谢枋得称赞其活人无数、解救建阳百姓的做法，面对仕元的汉人，只要是一心为民的父母官，谢枋得就不吝赞誉之词。“冰玉古溪山，治中今士元。邦人敬文简，道化望曾孙。朱子书堂在，东莱讲席存。十年儒道晦，此日啼登门。”³⁷ 在《送刘治中之信州》，对于仕元的朋友，谢枋得没有指责之言，反而更多勉励，希望刘治中能够重振儒道。

再看这个时期谢枋得的作品，其作品大多平淡无奇，与相士、道士、丹士等江湖人物谈命、交游，算命、谢诗、送别、题赠等题材占了诗歌的绝大部分。这些诗貌似敷衍而成，享受生活，写着不痛不痒的日常。相比于以前道教类的作品，更多了一点生活气息。例如：《谢惠椒酱》、《谢惠药》、《谢刘纯父惠布》、《谢张四居士惠纸衾》、《谢送夏衣》、《赠相士郭少山》、《赠相士吾楚峯》、《赠宋相士》、《赠卜者张易齐》等，不一而足。

定居建阳之后，谢枋得执教于乡里，同时也以算卦占卜为生，生活虽然贫困，但好歹还算安心自在。向阳而生，是万物之本能，求生不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毕竟活着才是最为现实的问题。

故国已亡，何以待新朝？三封却聘书可见谢枋得态度。“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小儿传到郡县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诚无伪，以公灭私，明达治体，可胜大任之才。”、“弓旌招贤，轮帛迎士，此礼不见于天下久矣，岂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经世者，孰不兴起。”（《上程雪楼御史书》）³⁸ 可以看出，谢枋得称呼元世祖为皇帝，并称元朝为清明之世，还盛赞元世祖此次征召行为，其对元朝的态度可见一斑。“皇帝本无灭宋之心，郝奉使将命来南，欲使南北百万亿苍生，同享太平之乐，至仁也。”、“皇帝之礼三宫，亦可谓厚矣；皇帝保全亡国之臣，亦可谓有恩矣。”³⁹ 还有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皇帝慈仁如天，不妄杀一忠臣义士。”、“蒙皇帝以礼招徕。”⁴⁰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虽不乏为达到拒聘目的而故意奉承之意，谢枋得此时对元廷的态度，已然平和地接受了改朝换代的事实，

³⁵ 同上注，页 20。

³⁶ 同上注，页 157。

³⁷ 同上注，页 137。

³⁸ 同上注，页 1。

³⁹ 同上注，页 5。

⁴⁰ 同上注，页 11。

承认了元朝的统治地位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同时，从谢枋得对恩师留梦炎不同时期的看法也可看出他对于元朝政权的态度。

在被征召之前，谢枋得仍然感激留梦炎当年的知遇之恩，让进京的史县尹问候老师。“回思少年遇知己，如忠斋留公”、“子游中原，过齐鲁燕赵，当历历为予问之。”⁴¹ 而留梦炎早在德祐二年（1276）就已降元，此事谢枋得已知，但他全然没有流露对老师的指责，恭敬如斯。被征召后，谢枋得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在写给老师的书信中，刚开始他还替留梦炎的降元行为开脱，“奔驰四千里，如大都拜见皇帝，岂为一身计哉！将以问三宫起居，使天下后世知君臣之义，不可废也。”⁴² 书信中间部分，谢枋得就对老师推荐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乃谓先生以贱姓名荐皇帝过听，遂烦旌招”、“奔走逃遁，不胜其苦……从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赐而何？”⁴³ 有些事，老师您能做，我却做不到。此次推举对谢枋得造成了许多困扰，言语之中，对恩师颇有微词。但总体上谢枋得对留梦炎还是很客气的，让老师看在师生情分上，为自己陈情。

然而在第三封却聘书《上参政魏容斋书》中，谢枋得言“以缙经见留忠斋诸公。”⁴⁴ 如果硬要我北上做官的话，自己将穿着丧服去见老师留梦炎等人，这何尝不是一种警告示威？且谢枋得进一步发出了质问：“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误大宋，后误大元，上帝监观，必有报应，诸公自无面目立于天地闲。”⁴⁵ 他们这些不顾个人意愿强行拉他仕元的行为是会遭到报应的。无论言辞或态度相较之前都激烈许多。

到达大都谢枋得被安置在怜忠寺庙时，因绝食多日已经奄奄一息，留梦炎派人前来看望，《宋史·谢枋得传》记载：“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弃之于地。”⁴⁶ 从谢枋得摔汤药的举动来说，此时的他对老师的态度更多的是愤恨，已经丝毫没有情分可言了。从谢枋得的态度转变，可看出谢枋得对于元朝的统治是默认的，即使在前朝为官、现在仕于元朝也没有关系，但只要不逼迫我为元官，一切都可相安无事。故此，即使是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只要远离政治，谢枋得仍可以闲民的身份活下去。

三、于生死节义间艰难抉择

五次征召中，前四次谢枋得拒绝后，征召之人没有再勉强。但第五次时魏天祐颇具强制性。起初，魏天祐并非奉旨征召，而是见朝廷急于求贤，邀功而

⁴¹ 同上注，页 34。

⁴² 同上注，页 5。

⁴³ 同上注，页 6。

⁴⁴ 同上注，页 11。

⁴⁵ 同上注，页 12。

⁴⁶ 同上注，页 157。

为。“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才为急，欲荐枋得为功……强之而北。”⁴⁷ 两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谢枋得对魏天祐是傲岸无礼，坐而不对；而魏天祐也同样反击：“天祐自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让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安仁之败，何不死？’”⁴⁸ 魏天祐对谢枋得没有战死沙场发出质疑，言外之意即当初没有殉国，现在反而讲起节操，且将谢枋得关在大牢派人严加看管。即使有此前的争吵，谢枋得还是在后来的《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表明自己愿为大元闲民的想法，希望说服魏天祐，但魏天祐都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就算是绑也要把谢枋得绑去大都。僵持至此，魏天祐已不是在为朝廷求贤，倒是多半出于个人意气，一定要把谢枋得当作一个囚犯押解进京了。⁴⁹

其实，对于谢枋得到底能否仕元，蒙古人并没有那么执着。第三次蒙古人忙兀台受任征召，并没有强迫谢枋得，《忠昭录·谢枋得》记载：“行省忙兀台奉旨驿召，亲临访问，执手相勉。……丞相义之，不强也。”⁵⁰ 不仅征召时态度友好，面对谢枋得拒绝时，反而大加称赞。相比之下，南人魏天祐的做法不免有嫉妒及其他复杂感情参杂其中。

当谢枋得得知魏天祐无论如何也要将自己押解大都，他明白自己要成为第二个“龚胜”了，未来如何，恐怕不是完全自主决定的了。对于文天祥北上之事，谢枋得不可能不知道。王炎午，早年追随过文天祥，捐家产以助军饷，积极抗元。文天祥被俘后，曾作《生祭文丞相文》，力劝文天祥殉节，并且张贴于文天祥押解大都的必经之路。一千五百余字的生祭文，反复阐明死节之道，列举文天祥可死的各种理由，甚至还为他想好了死节的办法：要么骂敌而死，要么绝食七日而亡。还有汪元量作《生挽文丞相》诗，劝文天祥以忠孝白天下，不一而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果不其然，谢枋得北上之日，门人朋友无不作诗勉励他殉节尽忠，成就大义。

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十八，谢枋得即将被押解北上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江南。北上之日，众人纷纷来送行，但他们无一不是劝谏谢枋得殉节。著名遗民王奕、陈杰都是江西人，与谢枋得同籍，他们都有着很深的交情。闻之谢枋得北行，他们或从江西赶来，或守候在谢枋得北解途中，与之赋诗而别。王奕素与文天祥、谢枋得友善，赋《谢叠山先生己丑（当作戊子）九月被执北行闽士以诗送之倚歌以钱》，其诗云：

其一

皇天久矣眼垂青，盼盼先生此一行。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长伴屈原清。
两生无补秦兴废，一出诚关鲁重轻。白骨青山如得所，何消儿女哭清明。

其二

襄汉无人替一肩，遂令杞国坠青天。是谁铸此一大错，此事公知三十年。
尽爱中都为宰相，岂知上界有神仙。纵饶不返南飞翼，也合津桥化血鹃。⁵¹

第一首是依韵和叠山诗《魏参政执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诗别二子及良

⁴⁷ 同上注，页 157。

⁴⁸ 同上注，页 158。

⁴⁹ 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 109。

⁵⁰ （宋）佚名，《忠昭录·谢枋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页 39。

⁵¹ 《全宋诗》卷 3393，页 40378。

友》，鼓励友人舍生取义，全节而终。颌联用对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与宁死不忍离开故国的屈原作比喻，希望谢枋得要像诸葛丞相和屈大夫一样忠贞不贰；颈联化用《史记》中“两生”典故，以“两生”不肯仕汉的故事，暗示谢枋得北解之行要以名节为重；末联意味深长，敬劝谢枋得要死得其所，青山处处可埋忠骨，鲜明地表达了对友人北解大都以身全节的期望。第二首是临别赠诗，激励好友身死国事，化仙南返。前四句回忆贾似道荒淫误国，表达对奸相误国的愤慨，也表达对友人不畏权贵、正直敢言的钦佩之情。后四句勉励友人以死殉节，做那啼血的杜鹃为南宋亡国的命运而日日悲鸣。

昔日好友王道可写道：“希夷何意出山中，心事当年汉卧龙。行止但凭天做主，别离初不泪沾胸。定知晚竹能存节，未必寒松肯受封。大义昭明千载事，前程尽而好从容。”⁵² 前来送别的门人中，赠诗影响最有力量的是张子惠，意图更是直接，有力，“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⁵³ 此外，何中、毛直方、叶爱梅、游古意等也纷纷赋诗送别，“期公必死也”（《张子惠传》）。这对谢枋得绝食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在巨大的舆论声中，谢枋得陷入了微妙的道德困境，其生死全然已非个人之事了，俨然成了纲常名教的卫道士。且谢枋得与文天祥为宝祐四年（1256）同科进士，有此珠玉在前，在忠臣不侍二君等气节观念之下，谢枋得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不受影响的！所以，当馆伴者恐吓他驿馆附近是文天祥被斩之处时，谢枋得答道：“当年集殿赐进士第，幸同榜，今复从吾同年游地下，岂非幸耶？”⁵⁴ 如若谢枋得北解不能坚持操守，那将是对故宋极大的讽刺，也将是谢枋得人生最大的败笔。因此，于公于私，谢枋得此行唯有以身殉国才能告慰故国，才是北解事件的最终也是唯一的结局。

其实，宋亡若干年后再次出仕，并不影响大节。戴表元、汪元量等都曾出仕过，尤其是赵宋宗室赵孟頫，其出身极其高贵，系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即民间所说的“八贤王”之后，是真正的皇族后裔。元世祖曾让赵孟頫比较留梦炎与叶李优劣，他说：“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⁵⁵ 虽是对留梦炎的评价，但也侧面表现出他对元朝的认可。此外，谢枋得并不如文天祥、陆秀夫那般居高官要职，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可惜，谢枋得没有文天祥的刚烈果敢，也没有赵孟頫的通达自适。同样，作为推荐过谢枋得的留梦炎，他与魏天祐的不同在于，抛开所谓的私心，留梦炎对谢枋得还存有师生之情谊，并不想要谢枋得殉节，反而是真心实意希望他可以元官，走上仕途。

但是当遗民和逸民不能共存时，谢枋得最终选择了殉节。至于谢枋得为何最终选择了千里迢迢北上、一路绝食的方式殉节，且历时半年左右，有受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传统的影响，也有其珍惜生命的一面（生之欲望，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或许也有塑造自我形象的因素在其中。相比于其他方式，饿死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谢枋得此次北行，是一次无法预知的抗争，可以说是一场赴死的“表演”，通过这次长时间的不断绝食，传达出自己的坚贞不屈，不断强化在他们心

⁵²（宋）佚名，《送叠山先生北行》，载《忠昭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页184。

⁵³ 同上注，页39。

⁵⁴ 同上注，页39。

⁵⁵ 柯劭忞（民国）编撰，《新元史》，卷一百九十·列传第八十七。

中的形象。⁵⁶ 他利用最后的时机，为忠君爱国、扶植纲常的道义做最后的坚守与弘扬，尽到为人臣子最后一分努力。

事实上，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效果。宋亡前后，为宋殉节的人不在少数。樊城守将范天顺，在城破之际殉城；陆秀夫在无力回天之时背负幼帝跳海溺亡，他们的事迹更为英勇悲壮。同样，宋亡后，也不乏一批士人坚守着对宋的忠诚。郑思肖画兰只画根不画土，林景熙扮乞丐收集高宗、孝宗之遗骨并重新安置；还有谢翱、家铉翁等忠宋之臣，而谢枋得只是其中普普通通一位而已，如果没有后来的魏天祐强行而北，众人声势浩大作诗唱和以及谢枋得一路绝食北上而死得轰轰烈烈，谢枋得在后世的影响也就绝不会有这么大。“谢枋得的所作所为不一定是沽名钓誉，他在宋亡之后的表现，原本用“破城而逃，隐居不仕”八个字便可概括，若不是魏天祐逼迫他闹出后面的种种事件，和他自己善于铺张扬厉，恐怕不至于与文天祥齐名。”⁵⁷ 文天祥不投降而死，谢枋得不归顺而亡。文谢之死，一个最烈，一个从容不惧，在宋代都不是绝无仅有，但格外独特。不管谢枋得是否预知到这般结局，亦或事不由己，我们都已无从得知他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一位民族英雄的敬仰，对一位用生命捍卫信仰的文人的钦佩。

五、结语

谁曾料想，本想以大宋遗民、大元逸民活下去的谢枋得，终究还是在元朝覆灭十年之后走向了死节之路！他的死，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想远离政治在元朝安安分分地自然终老，一方面是元朝欲重用、而自己又不能仕元。但谢枋得在不得不面对生存还是死节的抉择中，最终还是选择了殉国，参照圣贤，以绝食的方式，选择了以宝贵的生命维护心目中最高的道德标准，成了纲常伦理的卫道士。谢枋得没有死在宋朝危亡之际，而是殉节于元朝统治日趋稳定和强大的状况下，在他身上，体现了信念高于生命的事实。

因此，在面临名节、生存等最为严峻的问题时，他表现出最为激烈的行为和言辞。他是宋朝的最后一位孤臣，是那一个时代转变的终止符，却余音悠远。

（本论文为中国江西省人文社科项目“赣鄱文化与两晋南朝士人研究”（课题号：20WX19）阶段性成果）

⁵⁶ 朱春洁（2021）。〈寒侵·冷地·冰心：遗民流人的寒冷体验与北方抗拒〉。《浙江学刊》，第5期，页199-207。

⁵⁷ 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113。

【征引文献】

一、古籍

- 佚名（宋），《昭忠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 元脱脱编制，《宋史》（北京：中华书局在出版社，1985-6）。
- 班固（汉），《汉书》卷72《两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 谢枋得著，雄飞、漆身起、黄顺强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二、专著

- 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张宏生，《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
- 杨镰，《元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柯劭忞（民国）编撰，《新元史》（1922）
- 俞兆鹏，《谢枋得年谱》，（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 俞兆鹏，《谢叠山大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 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 陶然等，《宋金遗民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三、学位论文

- 卞威，《谢叠山诗文论谈》（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07年。
- 刘玲娜，《论谢枋得》（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8年。
- 闫雪莹，《亡宋北解流人诗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

四、期刊论文

- 朱春洁，《寒侵·冷地·冰心：遗民流人的寒冷体验与北方抗拒》，《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页199-207。
- 刘婷婷，《文、谢之死：兼谈宋亡之际士大夫的人伦困境与抉择》，《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1期，页5-8。
- 温海清，《文天祥之死与元对故宋问题处置之相关史事释澄》，《文史》，2015年第1期，页73-101。

五、外文文献

- De Pee, C. (2022).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 - 1279 C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6 (2).
- Eddy, R. A. (2008). Heresy and orthodoxy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279 CE).
- Hartman, C. (2023).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 - 1279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jiang, L. (2007). 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 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4), 513-546.
- Sen, T. (2002). The revival and failure of Buddhist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ung Pao*, 88 (Fasc. 1/3), 27-80.